

臼井佐知子著《徽州商人の研究》

东京：汲古书院 2005 年 2 月出版

常建华

（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天津 300071）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徽学研究，经过 20 多年的积累，似乎已经到了进行阶段性总结的时候了，近年来接二连三有徽州研究的专著问世，2005 年又有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外国语学部教授臼井佐知子《徽州商人研究》的问世。

《徽州商人研究》除了契约照片 12 张、地图 10 幅、序章、后记、英文目次、中文要旨、索引 2 种外，正文分为三部，下面首先介绍序章与三部分的内容。

序章《徽州和徽州研究》，重点论述了徽州文书和徽州研究。关于徽州研究，介绍了中国、日本以及其他国家的徽州研究状况。作者认为各国的研究课题是不同的，首先是方法论的不同，中国是由明清史学界研究者形成“共通的问题关心”选择方法论，并左右研究课题；日本和欧美的研究则采用社会史与社会人类学的方法较多，论述土地所有关系、社会身分以及阶级关系为多。其次，中国学者所关心的是偶尔所看到的事情，日本和欧美特别是欧美的研究者关注极特殊的事情的理解。1990 年以前的中国、日本徽州研究探求中国前近代社会的普遍性格，欧美以及 1990 年以后日本和中国的研究，探讨徽州的特殊性或者以地域为视角的研究相对较多。本章还介绍了徽州文书、族谱、日用类书以及其他资料。

第一部《徽州商人及其商业活动》由第一章商业和商人的历史位置、第二章商业活动和网络^①、第三章徽州汪氏的迁徙与商业活动^②以及补论徽州商人和近江商人的商业伦理比较^③构成。臼井佐知子认为，网络的建立说到底是人际关系的协调，徽商网络是构筑在血缘和地缘关系基础之上的。共同的始祖成了徽州商人确认自身的同一性以及共通性的关键所在。宗族血缘圈不仅没有向内收缩，反而保持着向外扩张的趋势。徽商的人际关系物化了融通资金、雇佣关系和族谱编纂。作者特别以徽州汪氏为例，进行深入的个案分析，认为徽商迁徙、移居的原因一是由于受战乱的影响，二是出于经商的需要，三是居官受调遣。作者还指出，随着徽商在以江、浙为中心的各客居地的定居，汪氏一方面要尽可能地融入客居地的社会圈，另一方面，又竭力保持原来的血缘、地缘圈。难得的是臼井佐知子进行了中日商人的比较研究，得出两国商人的差异性在于：日本近江商人的商业道德受到佛教净土宗的影响很大，他们认为商业的成功除了自身的努力之外，还须依靠他人和神佛的力量，但在中国则普遍认为“以义为例”，即用“义”为手段来追求“利”，而没有依靠其他人的思想。她还引用余英时基督教是外在超越型的宗教，而禅宗是内在超越型宗教的观点，提出欧洲、日本的商人认为获利要靠神和佛这些宗教存在，即超越个人的外在力量。上述观点，都是很有启发性的。

第二部《徽州典当和典当业经营》由第四章徽州的典当、第五章典当业经营和利益分配——以《清康熙三十六年徽州程氏应盘存收支总账》为中心两章构成。作者的研究进一步明确了“典”与“当”的区别以及因时代的变化而产生的两者的变迁，贷款的货币因时代不同而变化，担保中的田皮要素增加现象是何时开始的以及有何意义，有关利息的支付方法。作

^① 本章部分内容以《徽商及其网络》为题的中文稿，发表于《安徽史学》1991 年第 4 期。

^② 本章有同题中文论文发表于《江淮论坛》1995 年第 1、2 两期。

^③ 本文的中文稿《试论中国徽州商人与日本近江商人商业伦理之异同》，分别收入唐力行主编《家庭·社区·大众心态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黄山书社 1999 年版与周绍泉、赵华富主编《98 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者特别探讨了徽州程氏典当业的经营与利益分配、贷款处理方法等。第四章所列“《徽州千年契约文书》中的‘典’、‘当’、‘借’表”详细提供了相关资料，第五章也列有八个表，列出各种项目的金钱额度。这些研究将以往的认识更加具体化和深入。

第三部《徽州宗族关系》由第六章宗族扩大组织化的面相——“扩大系统化型”族谱的编纂、第七章徽州的承继和身分关系^①、第八章徽州的家产分割^②构成。第六章探讨了明代开始的宗族重新组织化的具体动态及其带来的影响，分两节展开论述：第一节明代徽州族谱的编纂^③，论述了《新安大族志》、《新安名族志》、《休宁名族志》之间的关系、版本等问题，对现存族谱特别是“通谱”、“会通谱”、“总谱”、“统宗谱”的等扩大型族谱中的程、汪等17姓加以论述；第二节对于宗教的影响，论述了宗教关系文书、关于坛·庙·祠·寺·观等的创设年代和经纬、土地的“所有”和“捐献”的关系三个问题^④，作者以徽州文书以及徽州方志中与佛教寺院相关的内容为史料，对明代嘉靖年间推广的朝廷礼制改革等政策和宗族扩大化给时人带来的影响、如何使佛教寺院与祖先祭祀之间关系发生的变化进行了讨论。白井指出：“随着宗族意识的强化，即使是已被分割的家产也是属于宗族构成成员整体这一潜在观念得以形成，个人在捐献或出卖家产时，平时处在潜在状态的同族‘所有’意识会显现出来，因此，征得全族的同意成了不成文的规定。在明清时代，几乎没有个人向宗教团体捐献相当于家产的土地，且对寺院等的修缮工作往往采取同族人共同进行的形式。当时的社会状况以及人们的信仰方式正是这种社会现象的背景。”^⑤这些研究是以往比较薄弱的，作者的观点值得注意。第七章以“承继”即“宗”的继承为中心，运用相关的“入赘”、“卖身”、“应主、应役”文书，关心与之有密切关系的社会身份问题。第八章针对著名学者仁井田陞依据华北农村状况强调的中国均分遗产的不合理性：“中国的家产分割原则上是一种均分意义上的细胞分裂，几乎没完没了的这种分裂如果发生在农民身上，则是陷农民于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白井佐知子提出：至少在徽州，可以说“分家”乃至“家产分割”是因有能够分割的家产，才会到实施家产分割的阶段。另外，家业的分割导致经营不利的情况下，即便是暂时作了“分家书”，有时实际上也不实行真正的分家。还有就是分家时，作为“存众”亦即共同保有部分而留下来的家产并不少。总之，徽州地区的分家乃至家产分割，并非由理念先行，而是针对现实情况进行的。上述研究将继续嗣与均分家产的探讨更加细化。

下面接着谈一些自己的感想。白井佐知子教授对于徽州宗族的研究主要是以族谱为视角的，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观点。如通过比较分析程、王两个徽州最大姓氏族谱编纂史，认为“徽州的程氏一族，在元末开始的宗族扩大组织化运动中，把提倡‘大宗’的程颢作为来自徽州的人，以达到提高其一族的权威的目的。可以说程姓也正是想通过此举来发挥其在族谱编纂事业中的主导性、先驱性的作用……汪姓一族主要出自徽州，后效仿创作了从中原迁移来的‘史实’这一推理应该更加妥当。”^⑥她对程、王两姓早期历史的质疑，对于我们进一步思考徽州宗族的演变是有益的。近年来研究宗族的学者比较关注可靠始迁祖以前祖先历史的建构问题，从中发现宗族与地方历史的复杂关系以及社会文化的变迁。现在的徽州宗族研究集中在明清时期，加强明代以前徽州宗族史的研究显得尤为必要，而具体深入研究徽州各姓氏宗族制度建设与组织化的历史可能是有效的途径之一。

^① 本章的部分内容的中文稿以《徽州家族的“承继”问题》为题，发表于周绍泉、赵华富主编《95 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安徽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② 本章的部分内容的中文稿以《论徽州家族的家产分割》为题，发表于周天游主编《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西北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③ 该节中文压缩稿以同样的题目发表于《徽学》第 3 卷，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12 月出版。

^④ 本节的中文压缩稿收入唐力行主编《国家、地方、民众的互动与社会变迁》，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版第 70-86 页；又本节的第一和第三两个问题以《明清时代之宗族与宗教》为题的中文稿，发表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4 年第 1 期。

^⑤ 白井佐知子《明清时代之宗族与宗教》，《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4 年第 1 期，第 103 页。

^⑥ 《徽学》第 3 卷第 43 页，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臼井教授早期是研究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的，尤其对于李鸿章与江苏地方感兴趣。她注意到冯桂芬等人倡导并推动李鸿章进行减赋等地方财政改革，背后支持与配合的则是苏州的潘氏与汪氏，而潘氏与汪氏是明末清初迁徙到苏州的徽商后裔。徽商在经营活动中以血缘和地域关系织成了覆盖大半个中国的网络，于是她进入了徽商研究领域^①。徽商凭借血缘和地域关系活动，研究徽商自然离不开讨论宗族，臼井佐知子又进入了徽州宗族研究的领域。她的研究以徽商为重心，兼顾宗族问题，如果该书以“徽州商人与宗族研究”命名，可能也是适当的吧。

事实上，数量庞大的文书与族谱是徽州研究的支柱，利用这些资料研究徽州商人与宗族正是徽学的特色所在，探讨徽州的经济、文化，也离不开对于徽商与宗族的研究。臼井佐知子教授的徽州商人与宗族研究，其重要性显而易见。她使用社会学中“网络”这一重要概念，将徽州商人与宗族加以贯穿打通，使徽学的研究别开生面，重视理论观照与明确的问题意识构成了她的一大研究特色。而依据大量的资料进行细致分析则构成了她的另一大研究特色。臼井佐知子研究徽州汪氏的迁徙与商业活动，分析了 19 种族谱，探讨徽州的宗族关系解剖了 17 姓的族谱编纂，论述继承问题则使用了 241 种文书，由于综合使用丰富的资料，从而使问题的研究有所突破。她的这项研究，根据发表论文的时间，从 1991 年到 2003 年，而第二部的两章是没有发表的新作，长达 20 多年的研究保证了该书成为质量上乘的学术专著。

徽州文献丰富，研究已有相当的积累，但是对于史料的认识与研究的理念需要不断的调整，从而推进徽学研究的深化。有关徽州入赘、应役等文书的研究就说明了此点，傅衣凌、仁井田陞以及叶显恩等先生的早期研究重视阶级关系，主要从主仆关系、劳役讨论这些文书。臼井佐知子教授从继承的角度看待承继、入赘、卖身以及其他应役文书，认识就不同了。近年来有年轻学者利用这些文书研究徽州社会下层的婚姻^②，又弥补了婚姻家庭史研究的薄弱环节。作者在序章地结尾指出：“徽州研究的最大特点可以说还是在其丰富的资料上，包含徽州文书在内的庞大资料的存在，将迄今为止的个别性研究的种种课题，例如说土地所有关系、工商业、宗族和家族、地域社会、国家权力和地域行政系统、社会身份以及阶级，更关连思想、文化，使得综合研究成为可能。并且，特别在单独问题的研究中容易出现的误解也因此有了得到纠正的可能。而且因为这些资料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这对于考察前近代社会和近代社会连续的中国社会特点及变化提供了重要的线索。”我想这番话也道出了徽学研究的魅力所在，站在新的研究起点继续开展徽学研究，或许是今后徽学研究因该思考的问题，而未来的徽学研究也一定会有光辉的前景。

收稿日期：2006-12-21

作者简介：常建华（1957-），男，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① 参见唐力行《评臼井佐知子的学术思路》，《安徽史学》1991年第4期。

^② 胡中生《明清徽州层社会的非常态婚姻及其特点》，《安徽史学》2001年第3期；胡中生《卖身婚书与明清徽州下层社会的婚配和人口问题》，《明清人口婚姻家族史论》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胡中生《明清徽州的人口买卖与婚配》，《安徽史学》2003年第2期。